



# 史学方法

王尔敏著

中华书局

禁书

# 史学方法

王尔敏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方法/王尔敏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3  
ISBN 978-7-101-13072-0

I. 史… II. 王… III. 史学-研究-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447 号

---

书 名 史学方法  
著 者 王尔敏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72-0  
定 价 48.00 元

---

## 增订本自序

鄙人生平学术著作有二十四种，在国内出版者二十种，另有一种重复者不计，其中唯一被用于大学部历史系作教材者即是《史学方法》。此书虽用作教本，实据个人深心专门研究，讲求学术规制与严格义法，既供后生参阅，必当讲示规范。故此书当具有学术资格。

在此尚须略述个人教书经历。鄙人出身研究机构，而且在大学教历史课，大学系所讲中国近代史十二年，中国近代思想史十九年，近代史料分析四年，近代重大问题研究四年，近代史研究一年。而又在大学研究所分别任硕士班、博士班之专门课程。在我退休前之八年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分别给硕士班、博士班开课。俱是一年两学期，全年四学分之课。我的立场，凡教研究所之课决不可与大学部之课雷同。是故在硕士班开讲“方志学”及“历史地理”，分年轮开。方志学各在专门名家，我自按传统群书内涵，分章节讲授。至于开讲“历史地理”，则是完全开新内容。早先世所熟知之“历史地理”乃是沿革地理，专门名家乃是岑仲勉先生。鄙人佩服而不加引用，我所开

讲之历史地理乃完全不按旧章,不仅不用沿革地理,亦不讲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鄙人之“历史地理”乃得自于业师地理学大师沙学浚之《史地综论》所采用之“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正是近代后起之新学问。例如我讲到香港、新加坡,其位置价值是十字路,而直布罗陀之位置价值乃是堡垒。讲到空间价值,地中海之空间价值,乃是欧洲全部之安全保障,若不能掌控地中海,欧洲难得安宁。因是乃罗马帝国必须争夺非洲,三次大战乃灭亡迦太基。近代拿破仑争夺北非败于纳尔逊。二次大战时,希特勒派隆美尔争夺北非而败于蒙哥马利之手。看来今世仍重要,尚无人能完全掌控地中海。

我当然也就大中国历史举例分析,凡长城、运河亦是重要论题。

至于师大博士班之课,我亦开讲两种学课,亦是一年四学分,分年轮开。我开讲“中国古代典籍”有四年,开讲“掌故学”有三年,开讲“清人简牍”有一年。这些课全是由我所创,但我不要自专,而盼望史家同道也开此课,尤其大陆大学之盛,大师以数十计,专门名家以数百计,他们开课决胜于我。

关于史学学问专门,我经研治即有著作有五种书。若《新史学圈外史学》属于史学通论之类,若《二十世纪之非主流治史学与史家》乃属史学史之类,若《史学方法》乃为方法学之类。此外著有《中国古先智慧今诠》以及《演史开新别录》,此二者则属我个人之史学开拓之类。此处所著后者之两种,无不免冒昧仿入古学类。

想来,中国大陆之古学盛状,岂敢妄想插手探讨此一领域,在此自须略作申解。前已提及大陆古史大师以数十计,古史名家以数百计,我等末学岂敢犯此领域?须知学术界必要弄清楚人弃我取,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万千题材,未必样样兼顾。我等在台湾同道治学者,竟有人研治到大陆所向来未涉论之问题,可略举事实。有位中国政治史学的

缪全吉博士(已故台大教授)著有《明代胥吏》，大陆研治政治制度无人论及胥吏，亦决未见成书，而使缪教授领先。缪全吉教授另著有《清代幕府制度》，大陆学者亦尚无人谈及，更无此类书。看来俱被缪教授领先。两书应可传世不朽。再举我近代史学同事魏秀梅教授，著有《清代回避制度》，大陆向无人论及此学掌故，自无成书。魏教授此书自亦当传世不朽。再有吾之门人刘德美博士(已退休教授)著有《清代学官制度》，通论清代之教谕、教授、学正、训导等职十分详备。大陆亦并无人涉谈学官制度，刘教授之书亦可传世不朽。

我之敢于插手古史，亦正在于人弃我取。举实而言，同一世代，大陆绝不愿谈王道。哎呀！这样高尚学术，怎可不谈。因而我写三篇论文，一是《中国上古之存祀主义》，我自殷商武丁论起，以周武王为代代主轴，包括孔子、司马迁之言论，足以表现“兴灭国、继绝世”之伟大思想。今世大陆学者绝对不会涉谈神仙。鄙人写两篇文章大谈神仙，俱载上述拙著之中，敬祈同道名家取以评判指教。

我们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俱必主张学习他人，仿行外国学问政教，乃是中国向西方反应而讨论，同时也接受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理论，即是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我们提倡仿习西洋之见，乃是为了国家富强，我国早期先知先觉魏源在 1844 年就已“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同仁也都是提倡者。

其实中国古代早有这种仿习他人之思想，即是《吕氏春秋》中的“贵因”，大陆无人涉谈，鄙人则写成《先秦贵因思想》一文，敬请同道识家教正。

凡以上陈叙个人之敢于演论古代史迹，多是本之于人弃我取，决不愿冒然涉论古代多人能谈之论题，尤其不会与人争一日之短长。

最后要说，鄙人撰此自序，一在表述个人之教学经历，使同道信任我能出版方法学之书；一在申明我个人对国内学风有充分了解；一在

盼望在校开讲方法学者能够以拙著为教材。作此交代，以释疑虑，弥望同道先进不吝指教。

河南王尔敏写于多伦多市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自序

二十世纪初始，梁启超创说“新史学”一个治学方向，遂自一九〇二年起，中国史学开出与前古不同之路，直迄二十世纪之末，史学固自人才鼎盛，但亦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新说层出，流派纷呈。原是可喜现象，而一些学者争夺主流，是丹非素，又不免歧异丛生，形成鸿沟。实质上争较宗主，反而嫉妒仇对，倾轧排斥。吾在其同代，自亦备览龌龊，真是今不如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史界主流学派就是包括疑古派的科学派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想潮流之盛世，自是风靡全国，但不久就出现马列科学派史学，日趋壮大。二者敌对甚深，互相丑诋。我亲自听到董作宾先生述说，郭沫若骂他们科学派史学家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亲自听到何炳棣近年讲演骂他们是“钻在老鼠洞里称大王”。其实更强烈的丑诋斥骂，在大陆报刊上多次出现，不必细举。虽是如此分野，但我这五十年来的治学是追随科学派史学流派的路子，我想我比任何同类史家更要注重科学。这本《史学方法》是我许多物证之一。我自

读大学，即追随新风气，用心于科学治史，始终不渝。

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连续开讲四个年度。接着草成此书，于一九七七年出版，算来已将三十年头。

大陆史学界对拙著之鉴赏知音，最早有清史名家王戎笙先生，他在二十余年前访美时得见此书，而寻章摘句，大量引入其所编《港台清史文摘》之中。自此吾在香港中文大学时有通信来往。嗣后上海熊月之先生访台，阅读拙著，亦多鉴赏此书。近十年间又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先生识赏，介荐于大陆出版。吾自欣然接受，并签合约。但爱惜羽毛，须先细校，并作增补，而实有增无删，代表吾于所作常保信持。我相信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今能在大陆出版，结识广众学人，盼得指教，实感荣幸。

梁启超所开创二十世纪新史学之路，于今百年，这一代史学之回顾，已有顾颉刚之《当代中国史学》和许冠三之《新史学九十年》可供史学史性之参考。但简括以观此一新史学时代中新路，所走出者厥为三个重点，表现二十世纪史学特色，即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学史，可代表二十世纪新史学之内涵。鄙人自是承时代风气，而有史学方法之作，大可以忝列梁启超史学之路一位忠实效力者。

拙作提供大陆学界，要先自省此书是否参考广博，网罗先贤旧闻、当世高见？是否具有完密架构，具申理层次？是否提正确积极判断，供学人参酌？是否讲究文字运用，典雅晓畅？经过详慎复校补充，愿以提呈史界评断，当负一切责任。

大陆史学界除前述三位学者我当深心感谢之外，其他相识学者，北京方面有李侃、刘德麟、陈东林、张海鹏、耿云志、王庆成、郝治清、欧阳哲生诸位先生，东北方面有关捷先生，天津方面有江沛、侯杰两先生，山东方面有戚其章先生，南京方面有张宪文先生，上海方面有易惠

莉、顾卫民、忻平、冯金牛诸位先生，杭州方面有陈学文先生，福州方面有林庆元先生，广州方面有陈胜舜、林家有、韦庆远、桑兵诸位先生，在此敬祈不吝指教。

饮水思源，我在此当申述研治史学方法的师承根源。五十年前受教朱云影业师的“史学通论”，受教于王德昭业师的“史学方法”，自是史学领域知识所本。虽然所著与师门所教已有不同，但启牖之恩不能不永存感戴。俾世人俱知我所学有本，本在何处。

本书学术责任，著者个人自负，凡海内外同道方家，愿意以文会友，有所指教，必当虚心商磋，互相协济以力求进步。

王尔敏

二〇〇五年十月

# 目 录

增订本自序 .....	(1)
自序 .....	(1)
第一章 引论 .....	(1)
第二章 原论 .....	(9)
第一节 史字 .....	(9)
第二节 史职 .....	(22)
第三节 史籍 .....	(47)
第四节 口传史 .....	(65)
第五节 史学 .....	(82)
第六节 史家 .....	(97)
第三章 通论 .....	(115)
第一节 史料 .....	(115)
第二节 史实 .....	(130)
第三节 记注 .....	(143)
第四节 解释 .....	(158)
第五节 理论 .....	(178)
第四章 分论 .....	(212)

第一节 选题 .....	(216)
第二节 结构 .....	(220)
第三节 引证 .....	(225)
第四节 表谱 .....	(230)
第五节 图版 .....	(234)
第六节 考辨 .....	(239)
第七节 注脚 .....	(244)
第八节 叙例 .....	(248)
第九节 文笔 .....	(253)
第十节 汇余 .....	(257)
<b>第五章 余论 .....</b>	<b>(262)</b>
<b>附录 阅读心得举例 .....</b>	<b>(279)</b>
<b>征引书目 .....</b>	<b>(299)</b>

# 第一章 引 论

史学方法是民国初年所发展出之一门学问，迄今尚未形成一定体制，全在讲授者自行设计，自行开创体例，故一面显示讲授之绝大自由，一面又显示涣漫杂乱，无所遵循。以往之五十余年，史学方法之著作出现不少，除若干零散常识可备采用者外，而所谓方法云者，多不免纸上谈兵，毫无裨于实际。有些条分缕析，十分琐屑，看似甚有系统，而实际用于研究，决难自信必然一一遵循，仍不免一派空言。

今日实际现象，大概所谓社会科学学者，最喜探讨理论与方法，往往人各一词，实际又不免大致雷同。固已使初学者无所适从，更严重关键，则在于理论虽多，而均有漏洞，方法虽新，亦多不适用，只可供作参考，以备更新理论方法之创造。然即令再次不断出现创新理论与方法，而实际上则亦不过多出一种理论与方法，以增加原已繁乱杂驳之现象而已。至于展望未来，则新理论新方法之继续出现，当终无有止期。此固显示学术进步，无有止境，而千百学者之耗竭心力，苦思冥索，创造理论与方法，其自信或确认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

惑，绝未料仅供学术发展过渡之参考而已。或竟转眼之间，而成明日黄花。至莘莘学子何其不幸，而随新理论新方法任其播弄一时，随风波流转，甚至奉为真理不二法门，终生不悟。检讨过去，环顾学术现状，与教学需要，终不能不戒慎警惕，以信撰述方法论之不易着手。其间最大考虑，则在于检讨其是否有较持久之效用，以及是否影响后生之误入歧途。

阅读我国五十年前后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之书，学者未尝不是苦心孤诣悉力教导方法，但亦不免其无意中误人子弟。余亦从事教授此课，四年于兹，就经验而得，亦深知已加入误人子弟之行列。盖凡普遍概念之方法原则，似若天罗地网之周遍，而于实用之需要，则不能捉捕蝇蚋。此所以慨叹其误人之处。请任一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冷静思考，其所能以教人治学之有效方法何在？五十年来学界人士所高呼倡导之科学方法者，虽已响彻云霄，历久不衰，而充其实际，方法条理之内容又在何处？顾颉刚自述其科学方法有谓：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sup>①</sup>

在同一文中顾氏并说及其最深领悟亦不过如此。彼虽有意撰著方法论之书，不过仍是徒托空言，终未实现。然则标榜科学方法云云，仍不出“科学方法”四字，毫无实质内容。学界流风，通行五十余载，真成欺世之尤。至在“科学方法”一命义之下，一些老权威学者，个个像入定老僧，使人莫测高深，看不出丝毫破绽。曾有谁人写出一毫经验方法留给后人？此一鲜明高张之“科学方法”徽帜，所以徒蒙冒滥之污

<sup>①</sup>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九四页。

秽而无所用于治史之实情，又有谁能掩尽天下人耳目而敢称谓并无其事。

然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无论如何，治史之一门学问，岂可没有方法？既从事史学研究，又岂可不讲究方法？此余固不厌俗陋粗浅，不惮误人子弟之嫌，而终愿略提研究经验，以备后人之采择。唯须特为声明者，著此《史学方法》一书，旨在赎我罪愆，以谢往者四年误人子弟之重罪。而且决将远离现今通行科学方法之命义，不欲冒称，亦不愿同流。

凡属一门独立学问，实自然能发展出理论与方法，史学亦无例外，学者焉可舍而不顾。张致远（贵永）已就学术成长抒论其道理：

学术的变迁须受文化演进的影响。这门学问的历史愈久，变迁亦较有意义。无论哪一门学问，研究的程序终是由紊乱而趋于有系统的，由简单事实的凑合，一进而为普遍的推论。其次，就从外表事实的观察进而研究内心的关系及其特性。最后根据因果关系，研究这全部分关联的事实，当作有机体似的。这样照我们现在的观念说来，才是真的学术，这种渐次演进的情形，在史学的发展上亦是如此。<sup>①</sup>

何炳松亦言学问贵有体系：

总之，研究学问，贵有纲纪。所谓学能“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无不可为”（《戴东原集·年谱》）。若罔识大体，徒事赅存，则“一岁所出，不知几千百亿。岁岁增之，岱岳不足聚书，沧海不足供墨瀋矣。天地不足供藏书，贱儒即死，安所更得尺寸之

---

<sup>①</sup> 张致远：《史学讲话》，第二页。

隙，以藏魂魄哉？”（《章氏遗书·博杂》）。①

梁启超亦申言史为诸学科基础，当需及早建立史学体系：

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需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了。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②

西方史家伯伦汉（E.Bernheim）并言人类社会不可一日缺少史学：

具有演化动作之人类社会，苟一日存在，则史及史学亦将与之俱存，而就史料之性质而言，可知其前途并无止境可言。因之，史学尚有其他一特性，与之相关者，即由后来之演化阶段出发，易明了其先前之阶段，盖吾人得综观其结果，以知先前之演化，其趋向为何如也。③

盖今世史学前修，早已熟论建立史学体系之需要。此一近代学术自觉，明显可见。

既言建立史学体系，然则一切人手，必循一定宗旨方法，亦为共同之认识，自为不争之事实。此即五十年来大学史学教育必立史学方法一课之根本动机所在。讲义之编著，专书之刊行，亦为此一观念下之

①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三八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二至六三页。

③ 陈蹈译：《史学方法论》，第三〇页。

产物。张致远提出其必然意义，并确立其宗旨：

史学方法与史学的演进可以说是并行的。史学方法就是把材料变作智识的工具与途径。<sup>①</sup>

杨鸿烈亦为史学方法作一界说：

凡人对于现在或过去社会上种种事物的沿革变化有了解的必要，而即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更很精细致密地去决定其所代表或记载的事实的真伪、残缺、完全与否，然后再用极客观的态度加以系统地整理，使能解释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以透彻明白其演进的真实情形及所经历的过程，这样便是所谓“历史研究法”。<sup>②</sup>

李思纯并言及探讨史学方法论之基本用心：

夫方法论为肤浅之物，非学术之本身，曾何足取。吾非盲聋，宁敢厚诬中国史学之无方法。唯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此则译者所由从事之志耳。<sup>③</sup>

陆懋德并为方法问题，特言无中西之分：

盖学问之道，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而已。<sup>④</sup>

既言史学方法，其性质实际，本在于一般原则与普遍步骤，即使专用于史学范围之内，盖亦无异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门类自有之原则与步骤。虽称之为科学方法，本无关于得失荣辱，可与不可，亦毫无

<sup>①</sup> 张致远：《史学讲话》，第四三页。

<sup>②</sup>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第一五至一六页。

<sup>③</sup>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李思纯序》。

<sup>④</sup>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陆懋德序》。